

“批判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座谈会” 学者发言

编者按: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8家出版社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针对日本政府纵容“编纂会”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事件,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历史专家学者共30余人进行座谈。这里选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刘述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阶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罗焕章、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李良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何仲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林晓光、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副研究员林治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章伯锋、张振鵬、曾业英、姜涛、曾景忠、雷颐、居之芬、卞修跃、刘萍等人的发言。发言标题均由发言者自行拟定。

日本的侵略历史岂容抵赖

戴 逸

最近日本文部省通过了右翼分子编写的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认识出现了大倒退。该书在许

多关键问题上大肆歪曲历史,内容荒谬:慰安妇的内容全部被抽掉,南京大屠杀被认为是捏造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已删去,三光政策也不见了,侵略中国改写成“进出”中国。诸如此类的歪曲历史比比皆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作为曾被日本侵略过的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不能不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修改历史教科书,尤其是涉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日本的国内问题,而是涉及了亚洲国家的历史。日本作为侵略一方,亚洲各国作为被侵略一方,是历史事实。如果不承认侵略,掩盖了侵略罪行,就是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侮辱和伤害,就是表明日本某些人企图卷土重来重操杀人屠刀。对此,曾饱受日本之害的中国人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吗?

我们今天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并非斤斤计较,算陈年老账,而是担心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把军国主义毒素灌输给日本青少年,实现他们恢复大日本帝国的迷梦,因此一定要大声疾呼,反对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不能沉默不能含糊,要使国际舆论形成压力,以抑制右翼分子的活动。我们虽然不能直接去教育日本青少年,总可以告诉中国青少年,要他们毋忘国难、毋忘国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还有准备修改宪法,摆脱宪法的约束扩充军事力量,增加军费开支,从一个经济大国变为军事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或者和美国分享霸权。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是召唤已经死去多年的侵略分子的亡灵,企图重建军事机器,再现昔日“皇军”的威风,重圆征服中国的迷梦。容忍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就是容忍犯罪,中国和亚洲就不会安宁和平。

中国人民是善良正直爱好和平的,渴望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战火没有饥饿的土地上,但我们懂得这不是

一厢情愿的。如果日本右翼势力一意孤行美化侵略历史,企图复活军国主义,那末中国和亚洲人民只能做好准备,坚持反击,粉碎他们的侵略迷梦。

必须与日本右翼势力作长期斗争

刘述礼

日本右翼势力精心策划修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这部书稿歪曲历史事实,全面为侵略战争翻案,理所当然遭到日本国内正义人士及世界各国的猛烈抨击。

这部教科书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歪曲为由于中国排外的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引发了排外运动;鼓吹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有功论;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将日本进行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战争;同时还对东京审判横加指责。

纵观其送审的教科书中的错误,其基本观点是反动的,是在宣扬军国主义史观(皇国史观)。在战后半个世纪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府竟完全漠视铁的历史事实,对其随意篡改,这种做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日本右翼教科书的错误是严重的,其宣扬的军国主义史观必将妨害日本年轻一代正确认识日本侵略历史,危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危害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友好交往,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教科书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政府长期纵容、支持右翼势力翻案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一直鼓吹反动的历史观,蛊惑人心,此次又通过中学历史教科书企图改变年轻一代的历史观。修改历史教科书是得到日本政府和有些政客的支持的,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分析一下当前日本右翼组织中的国会议员人数,就可以得出以上结论。历史研究委员会由自民党 105 位议员组成,其中众议员 76 名,参议员 29 名。“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中有自民党议员 212 人,占该党议员的 70 %。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有国会议员 204 名,包括了自民党 184 人、新进党 13 人、太阳党 4 人、先驱党 1 人、无党派 2 人。日本最近三任首相都是日本右翼组织的成员,桥本龙太郎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总顾问,森喜朗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小渊惠三、森喜朗是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发起人。此外,各地方的右翼组织中也有地方议员参加,如日本会议大阪分会中有众议员 11 人,府和市议员 27 人。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组织或参加右翼组织,利用国家机器,鼓吹右翼思想,怂恿了右翼势力的膨胀。这不禁令人想起战时的右翼组织渗入政界的情形。

实际上,日本文部省从一开始就与鼓吹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组织沆瀣一气。1998 年 6 月,时任文部大臣的町村信孝在国会就教科书审定一事答辩中称:“历史教科书的偏向,正在研究在审定前能否纠正,通过选择能否改善。”他所指的“历史教科书的偏向”是 1997 年版的教科书中真实记述了日本侵略的历史。他的发言在当时向正在编写 2002 年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发出了信号,即在教科书中不要记载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1999 年 1 月,文部省非正式要求初中社会科发行者:在申请审定前把内容搞得更平衡些,重新估价作者构成。结果,部分出版社采取了措施,剔除了负责写慰安妇部分的作者。1998 年 4 月,文部省任命了一个与鼓吹修改历史教科书组织关系颇深的人担任教科书调查官。此人把中国称为“支那”,是肯定日本侵略的右翼分子。在日本左翼组织的抗议下,文部省最终于 1999 年 11 月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但还是作为对审定教科书和对一线教育有很强影响力的督学官继续留在文

部省。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维护中日关系正常健康发展,对日本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批判。

我们强烈谴责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错误审定。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累累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损失。作为受害国家的人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历史事实,反对任何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

历史教科书事件说明,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是得到了日本政府支持的,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歪曲和否认历史的阴险的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无非是想改变年轻一代的历史观,为其树立政治大国而扫除思想障碍,从而复活军国主义,重蹈历史覆辙。一个不能正确反思其历史污点的国家怎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的倒行逆施,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挑战,最终只能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的境地。

历史教科书事件同时也表明,我们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日本右翼势力近几年来歪曲历史,为侵略罪行翻案的气焰十分嚣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与之作斗争,绝对不能让其目的得逞。一方面,我们要对教科书中的种种谬论深入系统地逐一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部门和社会,也应当针锋相对地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让青少年了解历史真相,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真相,牢记历史教训,鼓舞他们担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对日本右翼势力要进行严厉的揭露和批判

王桧林

日本右翼势力、残余军国主义势力,利用历史教科书及其他手

段,美化军国主义,宣扬对外侵略的正当性,做再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是由来已久的。这种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过去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反对。去年再次出现了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此前在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实有所批露,肯定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2000年几家出版社编写的送交文部省审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稿本,和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相比,对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侵略事实,做了删改和歪曲。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了过去被侵略国家的注意。

我们做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不能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和行动给以严厉的驳斥和批判。面对这种情况,从当前和长远考虑,我们史学界,特别是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研究者有以下工作要做:

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更广泛更细致地挖掘收集材料,进行更深入的揭露,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广大民众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

二、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右翼势力和对外侵略扩张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其产生和演变的社会的思想的根源与其存在的现实性基础和条件。这样的研究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研究仅仅是开始。

三、系统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掌权者和某些思想界人士的向外扩张思想和侵华“理论”。我们史学界对日本侵华的谋略、战略、政策已有不少研究和揭示,但不全面不系统。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侵华“理论”(这是他们制定侵略政策的“理论”根据)则只有少量的零碎的论述。这种研究应是一种基本的研究。理论的研究能更好地提高人的理论性认识。

四、我们作研究、写文章、搞宣传,针对右翼势力,揭露其罪行,进行严厉的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但对日本人来说,我们主要的读

者对象应是广大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对这样的对象我们写文章必须心平气和地摆出充分的事实、讲出充足的道理。我们对日本广大民众说话、提供读物的时候,必须照顾广大民众的民族情绪、国家立场。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是消除不了他国人民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消除日本右翼势力的危害,必须由日本人民去作。中国人不管尽多大力量也只能起辅助作用。

日本右翼势力的举动是违反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流的,是东亚和平与安全的危害,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障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坚决反对,严厉批判。

危险的信号

汤重南

“新编教科书”中的荒谬、反动观点,比比皆是,昭然若揭;日本文部省审查“合格”,放纵这一“新编”出笼,其严重性、危害性及恶劣的深远影响亦十分明显;“教科书”事件的争论和斗争已有三次高潮,这次右翼势力的攻势规模最大,不仅有政界的右翼政客兴风作浪,且有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右派学者煽风点火、蛊惑人心,背后更有财团撑腰,性质极为严重!

这里仅对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源及发展前景作一简略的概括。

一、今天这一严重状况,主要有以下八点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原因:一是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的扶日反共政策,不仅保留了负有战争罪责的天皇,而且许多民主化改革虎头蛇尾、半途夭折,从而使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极不彻底;二是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未得彻底清除,战后,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又死灰复燃,其影响在不断扩大,特别是战后日本教育的失误,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的一代,使这些青少年不可能都

正视历史,新生代中不乏公开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之人;三是战争遗属们受传统文化影响,从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父兄辈曾侵略他国,犯有罪恶,在右翼势力蛊惑下,易于同情甚至美化侵略罪行;四是日本的选举制度、组阁规则等,导致日本现任阁僚们可以一次次上演“失言”的闹剧,这种政治结构不改变,闹剧仍会一再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五是日本发展为经济大国后,欲发展为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大国主义思潮有了经济支撑,使一些人产生“重振国威”、“重温旧梦”的思想,一些极右翼分子甚至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故总想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六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思想右倾化持续发展,许多反动历史观大有蔓延之势;七是战后日本社会和法律容忍右翼分子、右翼组织的右翼活动,容忍否认侵略、美化侵略的言行,从而助长了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逆流;八是日本政府的重要成员,甚至有的总理大臣(如桥本龙太郎、森喜朗等)、阁僚大臣本身就是政界的右翼头目,加之日本议会中的不少议员亦是极右分子,他们支持纵容,甚至直接参与右翼活动。说到底,以“皇国史观”为其信条的右翼总头目就是日本天皇,这是最根本的政治根源。

二、这一事件只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日本正在滑向危险的道路,也标志着它的一些战略性调整 and 变化。一是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未来走向值得人们密切关注和警惕!从以往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不要因为日本经济的不振而轻视日本,永远不能放松对日本的发展的警觉。二是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已有调整,冷战后已由北向南转移,改变以往主要针对前苏联的方向,转而将主要目标指向了中国。三是在外交上有一定的调整变化,基本的仍是以美日同盟为依托,但在争做“政治大国”、“国际国家”上下大力气,日本所鼓吹的“国际化”,实质上是“国际日本化”。四是在亚洲战略上有一定变化,原多强调日本是“亚洲一员”,这也

是要做亚洲雁阵之首,主导亚洲发展;目前已倡导日本要成为“亚太一员”,其范围在扩展,意欲向北美、澳洲拓展。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危险依然是日本与美国联手威胁中国安全,这尤其值得人们警惕。

我们的态度和对策应该是:有力回击挑衅,但掌握好“有理、有利、有节”,更关键的基本点仍然是韬光养晦,咬紧牙关,发展自己!争取我国家、民族的利益最大化!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稳定和平的发展。如果我们能清醒、理智地对待一切国际风云变幻,最后的胜利是有希望的,有保证的。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赵阶琦

今年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公然审定通过了有严重问题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将于明年4月新学期开始摆在学生面前。新教科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首次问世;另一种是原有7家出版社将按审定结果出版新版本。前者篡改日本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美化侵略战争;后者在日本侵略及其战争罪行的表述上也大幅度倒退。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上述教科书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撰“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皇国史观”,力图向日本青少年灌输“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思想,对日本的对外侵略及其战争罪行更是极尽美化、掩盖之能事。该书按战前军国主义的说法把对外侵略战争称作“大东亚战争”,把侵略战争的性质歪曲成“解放亚洲的战争”,是

所谓“自存自卫的战争”。称“满洲国是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近代法制国家。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号下,经济急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把吞并朝鲜说成是“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利益是必要的”,“合并韩国后,日本在朝鲜殖民地上修建铁路、开发灌溉设施,开始土地调查”。此等颠倒黑白的表述比比皆是,难以枚举。总之,该书把日本的侵略战争描绘为正义的战争、是正确的战争。对于这些胡言乱语,深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中国、韩国及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很自然地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对上述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行径表示愤慨的同时,对其他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及其战争罪行表述上的倒退也应予以强烈谴责。例如前述7家出版社的新版本除一家保留“侵略”外,其余6家均把“侵略”改为“进出”或其他说法。原教科书中的“从军慰安妇”、“三光作战”、“七三一部队”等有关日本侵略罪行的记述也大部删除,或予以淡化处理。这同样表明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在千方百计地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战争罪行。

令人费解的是,日本政府部门在日本侵略历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采取言行不一的两面态度。资料显示,早在1998年6月,当时的文部大臣町村信孝在国会答质询时就称:历史教科书存在偏向,今后有必要在审定前,或执笔前予以纠正。根据这一方针,在各出版社在编写教科书期间,政府有关官员亲自出面,施加压力,让7家出版社“自我限制”,“自主订正”有关“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有关日本侵略和战争罪行的记述。从而出现了7家出版社在教科书送审前“主动”删除或改写“从军慰安妇”等有关日本战争罪行记述的现象。不仅如此,在审定教科书期间,又更迭反对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的“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委员,使上述8家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得以顺利通过。这说明日本有关政府部门在此次修改和审定通过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起到了主导作用。然

而,当前述教科书获得通过,遭到中国、韩国等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和抗议后,日本政府又声称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坚持 1995 年村山内阁时期的认识,没有变化。对于日本政府这种言行不一、相互矛盾的做法,有的日本学者称之为“双重标准”,即对内和对外两副面孔。现在看来,1995 年村山首相有关历史问题的讲话已变成掩护他们在国内肆意歪曲历史的挡箭牌。

包括这次在内,自 50 年代以来日本共有 3 次修改教科书的高潮。每次高潮的背后都有执政党和文部省起推动和主导作用。50 年代中期出现第一次高潮。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抛出一份题为《令人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材料,大肆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是“偏向教育”,为修改教科书大造舆论。接着,文部省加强了对教科书的审定。这次审定的结果,有 80 % 以上的教科书被判定“不合格”。1982 年出现的教科书问题,先是由右翼和财界外围组织抛出《令人可怕的教科书》、《充满疑问的教科书》大造舆论,接着,自民党举行有关会议进行“声讨”,并把“彻底弹劾‘左翼偏向教育’”、“推动纠正偏向教育运动”列入自民党 1981 年和 1982 年的“运动方针”。在以上背景下,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中包括高中教科书在内,强令各出版社修改达 600 处之多。这一次更不同寻常。不仅有自民党和文部省的背景,还有右翼团体打头阵,一些知名大企业也提供大量资金,其声势之大远远超过前两次。

日本一些政治势力为什么兴师动众,拿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开刀?其用意何在,值得深思。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过去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战争罪行和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子孙后代问题,或者如一位攻击现行教科书最为激烈的右翼学者所说:是拿什么样的历史观“重新塑造现在日本人”的问题。大家知道,目前在日本基本上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肯定日本战前

进行了对外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的历史观,在日本称“太平洋战争史观”,现行教科书基本上是按这种历史观编撰的。另一种是否认日本侵略和犯有战争罪行、称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的历史观,即“皇国史观”。如前所述,“新历史教科书”是按这种“皇国史观”编撰的,它的出笼得到了部分政治势力的大力支持。因此,所谓教科书问题,实质上是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试想,如果用“皇国史观”教育年轻的一代,未来会把日本引向何方不是不言而喻吗?这是一条危险的路,最终有可能导致日本重蹈历史覆辙,值得亚洲各国人民警惕!

粉碎日本右翼的公然挑战

罗焕章

由日本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长是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指责现行历史教科书“带有自虐性”,宣称“要为恢复本国的正史而编写有见地的历史教科书”。去年4月该会向文部省申请审定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为此开始在电视上展示“清样”,并向学校、地方议会等各方面游说。该“教科书”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淡化甚至删除日本的侵略罪行,不仅受到日本国内各界正义人士的反对,而且受到中国及朝鲜、韩国、泰国、菲律宾等亚洲各国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今年2月22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此提出严厉的批评。3月3日,我国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要求将该教科书审定为不合格。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向日本驻华代理大使野本佳夫提出照会,指出无论怎样修改,也不能改变历史,并警告说,如果审定其合格,中国就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3月15

日,朱镕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中明确提出,教科书问题并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它是日本同整个亚洲有关国家和亚洲人民的问题。歪曲日本侵略的事实,就会伤害中国和全亚洲人民的感情。日本政府对修改教科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日本政府置国内国际正义舆论反对于不顾,悍然于近日审定其合格。这是 21 世纪日本鼓吹军国主义侵略的严重事件,是对中国和亚洲各受侵略国家和人民的猖狂挑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众所周知,日本从岸信介内阁以来,于 1958、1982、1986 年曾先后多次对历史教科书进行重大修改,在修改后的书中,“侵略”变成了“进入”,伪“满洲国”写成了“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罪恶的“大东亚战争”变成了使亚洲从欧美统治下的“解放战争”。这次的修改更是登峰造极。以“南京事件”,“资料上有很多疑点,事实究竟如何,对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轻描淡写的几十个字,即将 30 万人的南京大屠杀一笔带过。人们要质问日本政府,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知不知道 1938 年广田弘毅外相拍给华盛顿日本大使馆的电报,其中引述的特别消息“不少于 30 万的中国人遭到杀害”一事?你们能抹去日本书上的南京大屠杀,你们能抹去千万件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吗?能抹去 30 万死难者的白骨吗?

在新“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表述,已有 5 家出版社完全删去。这是右翼“编纂会”和出版公司执行政府和文部省意旨的结果。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强行抓捕中国、朝鲜等国的数十万妇女作日军的“性奴隶”,它严重侵犯了人权、人道法和国际惯行的保护妇女儿童法规。多年来,遭到受侵略国家的一致谴责,“慰安妇”受害者不断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1996 年 2 月,联合国调查官员就要求日本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赔偿和道歉,并追查和惩罚罪魁祸首。但是,日本政府却蛮横地说:“把 50 年前的问题作为重要的事情提了出来”,日本政府“不能承担责任”。这就是日本政府对待是非、

道义的态度,这就是日本政府体现的“国格”和“国德”。

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新世纪的主流,亚洲又成为新世纪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日本正确对待历史,接受教育,与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相处,是有利于本国也有利于世界的事。这是一条光明大道。鼓吹“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家”,否定它进行的扩张和掠夺战争是侵略战争,千方百计地掩盖、抹煞它制造的烧杀淫掠的滔天罪行,以神话蒙蔽欺骗国民和年幼的学生,培植蔑视歧视邻国的意识,其结果只能孤立自己,自走绝路。如果有什么蠢人还想借日本的“经济力”和某种势力的支持,重蹈军国主义的老路,再欺凌中国和亚洲人民,他们的下场只能比东条英机更惨!这就是结论。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特征

李良志

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起,即提出要修改战后根据“和平宪法”制定的历史教科书,以否认其战争罪行,美化其对外侵略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出现了1982年、1986年和现在的三次修改与反修改的高潮。不仅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日本为什么总要在历史教科书上做文章,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呢?原因有三:一、其历史、社会根源,是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办,其军国主义思潮更未受到彻底地清算。军国主义遗老遗少们不但逍遥法外,有的还当上了首相、大臣,他们组成日本政坛的右翼营垒,并一直成为主流派。这些人时刻都在谋求复活昔日军国主义的“辉煌”。二、其经济根源,是战后的日本,由于有美国扶持,其经济从60年代起飞,如今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的发

展,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军阀主义思潮,他们急不可耐地要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称霸世界。三、其时代背景,是战后美、日两国的勾结日益密切、强韧,帝国主义和称霸世界的共同目标,牢牢地把两国捆在一起。日本由于有美国的纵容,其修改历史、美化侵略、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变得更有恃无恐。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总是无中生有,但什么时候美国的当权者批判过日本右翼势力蔑视人权,任意修改历史的恶劣行径呢!难道这会是偶然的吗?

日本右翼势力这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有下列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

一、其修改范围之广,歪曲历史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如新历史教科书,极其露骨地宣扬皇国史观,认为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甚至把本来是神话传说的“神武天皇东征”,也当作真实历史写进教科书中,把神武天皇即位之日,作为日本的建国之日;歪曲九一八事变,认为事变并非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既定方针,而仅仅是关东军单独行事;歪曲“满洲国”历史,说什么溥仪傀儡政权是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现代法制国家,得到人民满意支持;彻底否认南京大屠杀,新教科书不再提日军屠杀30万南京军民的数字,只笼统说杀了一些人,或许多人,还说这一事件“疑点很多”;新教科书不再提慰安妇问题,也不再提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政策”等等暴行;对战争中日本强征受害国劳工、虐待劳工问题,则是尽量淡化;新教科书向读者暗示日本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如书中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问题时,故意不提中国等国的巨大伤亡及财产损失,却说战争中日军死186万,平民死66万;新教科书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歪曲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认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卫”,是为了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正因为如此,战后才出现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新教科书还认为日本吞并朝鲜,其目的是为了东亚的稳定,是合法的,必要的;又再次把自1982年日本文部省将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侵略”一词,改为“进入”,写进了书中,而这一篡改早已被世界进步舆论批判得体无完肤。

二、日本这次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同时,由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抛出了臭名远扬的《台湾论》。这本反动漫画全面歪曲日本侵占台湾的历史,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说什么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黑暗、血腥统治,是“最有良心的统治”;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首脑决定把台湾交还中国的《开罗宣言》“也并不存在”;这个《台湾论》,还胡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挑起的。日本抛出《台湾论》,是这次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看得清清楚楚。

三、日本这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强硬恣态。日本政府公开宣称,日本政府这次不会同过去那样,承诺日本教科书的撰写“要从获得国际的理解和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给予必要的考虑”;只要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没有错误,就批准其合格,不再进行“政治干预”,即使在外交上引起摩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日本这次不会再审定此教科书了。当然日本政府说不对教科书的撰写进行“政治干预”,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历次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风波中,那些首先跳出来摇旗呐喊的头面人物,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石原慎太郎、野吕田芳……等等,哪一个不是日本政府的大臣呢?不干预是假,幕后操纵才是真,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从来都是日本政府干预的结果。

四、日本这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是在鼓噪修改宪法的高潮中进行的。修改历史教科书,是要为昔日日本军国主义的劣行涂脂抹

粉,而修改宪法,是为复活军国主义鸣锣开道,做各种合法准备。如提出宪法应规定日本可“拥有陆、海、空军”,“国民有保卫国家义务”,国家行政权应“属于首相”,宪法中还应加入规定天皇为元首的条文,还要把“日之丸”、“君之代”等国旗、国歌等写入宪法等等。两个修改,一个目的,二者相辅相承。

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和史无前例地修改历史教科书,应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和高度警惕。因为,这是日本政局日益右倾化的明显标志,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严重讯号,是中日关系将发生重大逆转的讯号。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必须同朝鲜、韩国和当年遭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各国人民一起,同日本右翼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不能得逞。

台湾问题与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

何仲山

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了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这本宣扬“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所谓新教科书,将于2002年在日本正式采用。这是公然对中国人民挑衅的政治事件,我们中国学者表示坚决抗议。

教科书把日本近代连续发动的战争正当化,宣扬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是搞殖民主义,而是帮助亚洲各国人民得到自由解放。这是天大的谎言。就拿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来说,它强迫清政府割让了中国领土台湾、澎湖,还霸占了朝鲜,对台湾、澎湖和朝鲜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澎湖才归还中国,朝鲜也才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脱出来。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对这段历史也企图否定,和新历史教科书

一起出笼的还有漫画《台湾论》。在漫画《台湾论》中,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否定《开罗宣言》。这完全是配合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再次染指台湾的行径。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日益重视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竭力主张全面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日本政府曾明确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只与台湾保持地区性民间经济文化关系。但是在实际上,日本政府积极追随美国的步伐,利用台湾问题谋求自身利益。日本强调所谓台海安全形势对日本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将台湾纳入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由于李登辉访美引起台海局势的紧张,从1995年6月到1996年3月,中国政府和人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而日本当局对这场斗争指手画脚,1996年5月,日本参议院通过所谓《关于中国、台湾形势的决议》,对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表示“忧虑和关注”,干涉中国内政。1997年8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公然宣称日美防务合作范围理所当然包括台湾海峡在内。1998年5月,日本外务省官员再次作出类似发言。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日本政府才重申要按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处理涉台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在解释美日共同防御指针时,至今仍不肯明确说明其所谓“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问题。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右翼势力对台湾的野心从来没有放弃。这次历史教科书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1世纪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要顺利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做好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之外,还必须密切关注和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动向。严正批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希望日本人民识破右翼势力的野心,不要再蹈历史的覆辙,再受历史的惩罚。

必须关注日本新军国主义动向

徐 勇

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新教科书”得到文部科学省批准,取得合法资格,这是日本新军国主义右翼势力猖獗活动,政界加剧右倾化的重大标志。

北京大学作为一所成立最早的中国高等学府,曾遭受日军的直接破坏与摧残,能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近百年的侵华罪行作出最有力、最直接的见证。对于“新教科书”鼓吹“皇国史观”,污蔑中国人民“排日”、“反日”,美化侵略战争的严重事件。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必然要表示深切关注。

北大师生不会忘记,作为一所和平的学府,北京大学曾接纳过日本教习,广泛开展同世界人民的正常友好交流。北大师生希望有和平的办学环境,无论是开北大新风的蔡元培,还是日军兵临城下之际的蒋梦麟校长,都曾提倡以文化教育为己任,坚持学术本位。

然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破坏,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师生们的和平梦想。特别是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向华北扩张。倡导过“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的蒋梦麟校长,被日军于 1933 年以“反日”罪名拘押,日军还企图劫持蒋梦麟去大连。同时,日本又指责北大和其他各校实行“排日教育”,向中国政府提出“修改学校教科书”的无理要求。学子们悲愤地控诉:“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7 年日军发动全面战争,霸占北京大学红楼作为宪兵队部,全校师生被迫迁移内地,颠沛流离。北大师生和全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当时全国约有高校 108 所,被迫内迁或停办 94 所。为

相互帮助以克服办学困难,和北大共组为“西南联大”有两所兄弟学校,一是天津南开大学,由于遭受日机野蛮轰炸校园被夷为平地;再是清华大学,校园也被日军霸占作为军用。日本的枪炮和刺刀,使中国手无寸铁的普通教员和学生的生命、财产、教学活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损失。

而今,我们不能不对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感到愤慨:战争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日军用以祸害中国人民的“反日”、“排日”借口,竟然还被继续使用;日本军国主义野蛮的战争行径,竟然被右翼公然美化,写入“新教科书”,并由文部省通过审定,取得合法使用资格。

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政治前途深感忧虑:教育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行为,除了传授知识,它还具有引导、改变或统一社会道德、思想、舆论及行动等重大功能。战前日本浓厚的对外侵略的战争意识,即由天皇《军人敕语》、《教育敕语》所指引下的军国主义教育所造成。历史悲剧是否会重演?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进步学者与中、韩等国家长期以来的广泛的抗议,继军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工具“君之代”和“日丸旗”被确认为正式“国歌”、“国旗”之后,又审议批准了右翼势力所谓的“新教科书”,这将严重误导日本年轻一代,影响未来日本的政治走向。维护或树立皇国史观,否定战后民主改革的基本原则,最终将走向新军国主义的政治道路,导致日本社会政治的重大灾难。

北大师生不仅具有和平的学术传统,也具有光荣的无畏的斗争精神。北京大学成立伊始,即站在民族国家最前沿,无论是发动五四爱国运动,还是30年代反对日军入侵华北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始终都是中华民族坚持正义和平、反抗侵略迫害的坚强堡垒。

中国史学、教育各界坚决支持日本学者的正义行动,绝不会坐视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导演悲剧,一再篡改教科书、破坏中日两国

的正常国家关系。日本政府只有澄清历史问题,才能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正常合作,才能有助于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日本右翼势力

林晓光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历史问题尽管是 50 年前的往事,但由于历史问题关系到日本国内对当年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关系到日本国家能否坚持和平民主的发展方向问题,关系到日本能否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教科书问题的反复出现,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势力通过教科书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愈演愈烈,使历史问题在 50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影响着中日两国在战略利益、战略关系和战略走向上的判断和选择,仍然不时干扰着中日关系的大局。

在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右翼势力主要有:1. 右翼团体。据日本《警察白皮书》各年版记载,右翼团体的组织规模和成员人数自战后以来一直呈比较稳定的状态。1963 年时有 400 个团体、1.5 万人,1972 年有 500 个团体、12 万人,1980 年为 700 个团体、12 万人。另据日本平凡社 1982 年版《百科年鉴》记载,当年日本右翼团体有 720 个,12.5 万人。日本《选择》月刊 1989 年 1 月号所载《现代“右翼”之研究》中的统计数字则为,1988 年全日本右翼团体有 840 个,成员 12.5 万人。同一刊物 2000 年 5 月号的统计数字为,右翼团体 900 个,成员总数 10 万人。2. 右翼政治家。发表否认或美化侵略的言论,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利用对教科书的审查权为右翼势力张目。3. 右翼学者。代表人物为藤冈信

胜和西尾干二,两人均为大学教授,分别组织“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为侵略历史翻案。

被称为右翼理论家的荒原补水称,全日本的右翼分子共有353万人。这一数字虽与警方的统计相差甚远,却也不能就此认为荒原夸大其词。因为警方统计的只是那些积极参加街头暴力犯罪活动者,即只有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或侵犯的右翼分子,才会被警方记录在案。而荒原所说的353万人则包括了大量在思想上认同右翼的政治理念和历史观点,心理上 and 意识深层同情右翼的所作所为,按右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去认知历史、判断是非的日本人,被称为“穿西服的右翼”。这些人并不参加右翼团体,也不参与右翼分子的街头暴力活动,只是接近或参加某个具有右翼倾向的文化或宗教团体,他们甚至往往成为后备队,不仅为右翼势力提供思想理论武器,而且一旦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动、右翼团体猖狂活动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很容易从思想上的右倾转为行动上的坚定右翼。尤其是那些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众传媒等领域拥有较大影响的“名人”,对于日本的政府决策和国民意识的潜在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目前,日本右翼团体的骨干队伍依然故我,“潜在右翼”也大有人在,右翼团体赖以生存的社会、思想和阶级的基础并无根本改变。尤其是走上街头的行动右翼与活动在文化、教育、思想、出版、政治、经济等各界的“潜在右翼”正在进一步互相结合、相互呼应,以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作为幌子的右翼思潮和活动正在发展。如:每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对坚持历史真实的媒体或出版社以及个人发起文字攻击时,右翼团体的暴力攻击也会接踵而至。有日本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藤冈氏与其研究会起着右翼行动的‘司令塔’的作用。”而高桥史郎、入川智纪等右翼团体“日本青年协

议会”的10名右翼分子,又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因此,更值得注意的恐怕不是在街头吵吵闹闹的右翼,而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出版等各界上层的右翼化倾向。

就日本教科书事件向美国发问

林治波

4月3日下午4点,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8本新编历史教科书全部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

至此,日本左右两派力量就教科书编纂一事而展开的较量,以右翼势力大获全胜告终。

对于日本新编教科书的粉墨登场,笔者丝毫不感到奇怪,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这是日本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切反映。右倾化已成为日本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的主流,右翼分子在日本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帮。如今,日本右翼想干什么大多如愿以偿,而左翼进步力量则处于被动抵抗、节节败退的境地。教科书事件只是日本右倾化的一个小小逆流而已。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固然有其自身的种种原因,但美国也难辞其咎。

之所以这样说,根据有二:

一是战后主宰日本的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保留了天皇制,并竭力包庇纵容日本战犯和右翼分子,从而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埋下祸根。

二是美国对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美化侵略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美国向以世界宪兵自居,什么事情都要管一管。以人权为例,美国政府每年都要出台国别人权报告,对别的国家指手划

脚,横加责难。(关注人权当然不是坏事,但这种傲慢的方式大可商榷。)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一方面对许多国家说三道四,连中国的计划生育也成了美国人权卫士的指责对象;另一方面却对日本右翼势力抹煞历史、美化侵略的丑恶叫嚣缄默不语,听之任之。

如此之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国奉行的是双重标准。

从人权的角度看,日本右翼分子对教科书的修改、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实际是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赞许和肯定,是对人权的反动和亵渎。在那场长达 14 年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中国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导致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直接财产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 5000 亿美元。在人类历史上,对人权的侵犯和伤害,莫此为甚。美国作为反法西斯盟国,曾参与了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真相不是不清楚,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与中、韩、朝等国的批评谴责之间的是非曲直不是不清楚,但汤姆大叔却没有站出来仗义执言,说句公道话。

请问,你们的正义感哪里去了,你们的人权观哪里去了?难道因为日本是你们的盟国,你们就将正义与良知抛之云霄了?

许多美国人以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念为荣,并且怀有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念的理想。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确发挥着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作用;但是,如果美国人不能改变这种以利益划线的双重标准和虚伪庸俗态度,要想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在全世界推介开来,怕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

章伯锋

日本修改教科书已经多次了,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却是一个需要我们备加关注的大事。我认为这是日本全面复活军国主义的

严重信号,应予以高度警惕。我把它概括为一句话:“鬼子兵又要进村了!”根据战后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对侵略战争性质的历史认识和围绕修改教科书的斗争,是日本右翼动向的晴雨表。我说日本在全面复活军国主义,并非是危言耸听,仅谈几点看法。

一、日本现在的社会主流意识已经右倾化。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且愈演愈烈。特别是 1995 年世界各国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围绕着所谓“不战决议”,进行了充分的表演,自民党坚决反对为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和谢罪。为贯彻他们的这一反动立场,自民党成立了“议员联盟”并制定了“活动方针”。“方针”把日本过去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解放”的战争,明白无误地宣称要重新“解明历史的真相”,要翻这个历史罪案。而早在 1993 年 8 月,自民党议员即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95 年该委员会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对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和罪行,列出专题,全盘予以否定(其中包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日本政客为侵略历史翻案定调子,与此相呼应的是又有藤冈信胜、西尾干二之流的教授出面组织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大肆展开宣传活动,把攻击对象对准 1997 年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该会在日本全国各地建立分会,成员 1 万多人,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的右翼学者。其骨干成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成百万册的推向社会,廉价推销,猛烈地抨击现行教科书。据有关学者统计,该组织得到 90 多家很有实力的企业和 10 多家财团大力支持,每年提供巨额活动经费。日本的新闻媒体也为其呐喊助威,加以该组织每年都频频地举行大小集会宣传活动,因而表现出极大的能量。

由于在政治上有执掌政权的右翼政党的推动与支持,舆论导

向的推波助澜,右翼史观无疑对不知或不完全了解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战后新生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不能轻视这股思潮,把它看成仅仅是一小撮右翼分子的兴风作浪,实际上它早已形成一支十分可观的“右翼团队”,在日本社会获得了相对广泛的支持。应该看到日本现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已日益右倾化。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之所以逐步走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并且得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近代国民教育的军国主义化。现在日本执政当局正在重蹈历史覆辙。现任首相森喜朗不就是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吗!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皇国史观”正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指导思想。

二、最近几年日本内阁的组成,都是以复活军国主义为宗旨的右派头目当权,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都是这样的人物。日本政府在他们的控制下,其政治走向日趋反动,就不足为奇了。既使他们是一小撮,其反动的政治能量也不能低估。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就是以打砸抢起家继而登台执政,在当时欧洲各国政府的姑息纵容之下,而使纳粹德国羽翼丰满,结果给欧洲和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的大灾难。如果我们仍然对目前日本右翼势力,视为无足轻重的一小撮,岂不是自欺欺人。

三、日本的政治野心在美国的扶植下日益膨胀。美国视日本为其在亚洲执行霸权主义的忠实伙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签订及日本所谓的“周边事态法”的制定,已经在法律上确立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现在的美国布什政府又在拉日本参加导弹防御体系。上述种种举措,都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国。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中日友好还能维持多久?

四、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但战后日本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从来不肯低头认罪,这难道不

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吗！我认为中日友好不应是单相思，一厢情愿。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不能姑息容忍、过于“温良恭俭让”，而要针锋相对坚决斗争。这种斗争，不能仅仅是历史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坐而论道，所谓的摆事实讲道理，应有切实的政府行为。八年抗战是依靠全国人民举国一致浴血奋战取得胜利的，为此我国人民付出了死伤 3500 万人的巨大代价。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应该以人民为后盾，在这方面政府可采取的举措很多。例如支持民间索赔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都是非常有力的斗争手段。

日本政府难辞其责

张振^昆

日本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终于经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这本书严重歪曲日本对外侵略及殖民统治的历史，百般回护、掩盖甚至粉饰、美化当年日本的侵略。它只是日本右翼学者的心声，根本不宜于做少年男女课堂上的教材。从其送交文部科学省审定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日本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揭露和批判。对于这样一本书，日本政府当局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坚决予以否定，而它却别有图谋。

从理论上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每一本送审的教科书所采取的办法都不外三种：第一种，无条件地通过，可以叫做直接开绿灯；第二种，彻底否定，即开红灯；第三种，暂时不予肯定或否定，而是提出意见，令其修改，然后再视情况决定去取：这可说是先开黄灯，再开红灯或绿灯。前两种办法干脆利落，最后一种则显得迂回复杂。在实践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这本书恰恰采用了第三种做法。它没有为该书直接开绿灯，这大概是

因为该书中荒诞、荒谬、篡改史实、违背常识的地方太多、太显眼,社会各方面的否定性呼声太强烈,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太大,使它不便或不敢一下子就予通过,由此激起众怒,给自己造成难堪。但它又舍不得将其割爱,不愿意使其胎死腹中,所以也没有直接否定。它选择了第三条缓冲之策:先开黄灯。

文部科学省对这本历史书提出各种修改意见 137 条之多,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地表明了它本身的看法。原书稿据此做了修改后,顺利获得通过。那末,经过这样一段曲折而终于如愿取得教科书资格的这本历史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长西尾干二的一段话。他说:“文部科学省提出了严厉的意见。个别部分接受了屈辱性的修改。但仍保留着我们的看法。”“仍保留着我们的看法”一语集中说明了原书稿的根基、它的要害、它的“元气”并没有因修改而受到大的触动,更没有受到损伤,修改本不过是它的变种,两者在实质上并无根本区别。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小骂大帮忙”,日本文部科学省之于这本历史教科书就是实行了这条原则:尽管它对该书原稿提出 130 多条指摘(令其修改),有些似乎还很“严厉”,甚至使其感受“屈辱”,其实性质上都属“小骂”,幕后还是不伤筋不动骨地成全了它。从另一个角度看,那 130 多条指摘实际上正是为最后为其开绿灯创造条件:黄灯中隐含着表面上不易参透的玄机,最后换为绿灯则是实实在在、决定性地帮了该书的大忙。

从以上的简述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这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文部科学省以自己的行动承担起来的,是明确的、无法推卸的。第二,文部科学省既然对此书全面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原书稿吸收了这些意见后修改定稿,又经文部科学省首肯,那末书中的观点也就必然反映了日本政府的观点,这是明摆着的。

日本发生教科书问题,这不是第一次,10多年前就曾发生过两次。当时由于日本国内正义力量和亚洲各国的斗争,日本政府制定了“邻国条款”,承诺对历史教科书问题“要从获得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给予必要的考虑”。现在它违背自己的承诺,公然为曾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绝不能容许的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这证明它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完全抛弃了国际信义。这种事发生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是日本政府的一个新动向,也是一个新信号,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现在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一次历史教科书事件中,日本政府如此行动,是否破坏了、或者动摇了、或者威胁到了这个政治基础?对此需要做出判断。这样的判断不是学者们能够做出的,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来做,并由此采取比口头表示不满或抗议更有力和有效的行动。否则,日本政府将很可能得寸进尺。

我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

曾业英

不久前,继1982年和1986年两次发生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后,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了由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并宣布这一新的历史教科书将于2002年开始在中学使用。这一消息再次激起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我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这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这一新的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美化了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战争。关于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各国

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新历史教科书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宣告,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在叙述1943年11月东京举行的所谓“大东亚会议”时又说:“会议通过了提倡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经济、消除种族歧视等内容的《大东亚联合宣言》。明确了日本的战争理念。”明明是为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极端私利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却偏要说成是为了整个日本民族的“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是要“提倡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经济,消除种族歧视”。如果真如新历史教科书所说的那样,那请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当时贫穷落后的亚洲各国,究竟在哪里威胁到了当时经济、军事实力远胜于己的日本的生存和安全?是日本违背国际公法,派兵登上亚洲各国领土,还是亚洲各国违背国际公法,派兵登上了日本领土?是日本强迫亚洲各国“接受日语教育和参拜神社”,将日本的文化思想意识强加给亚洲各国人民,还是亚洲各国强迫日本接受亚洲各国的语言文字,将亚洲各国的文化思想意识强加给日本人民?是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建立所谓“满洲国”,将满族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分裂出去,恶意制造种族矛盾,还是中国等亚洲各国破坏日本领土完整,在日本国内再造一个什么“国家”,人为制造日本国家的分裂和种族矛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清二楚的,不是亚洲各国在威胁日本的生存和安全,而是日本在威胁亚洲各国的生存和安全;不是日本面临亚洲各国的侵略须“自存自卫”,而是亚洲各国面临日本的侵略须“自存自卫”;不是日本要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它企图取代欧美殖民势力,独自统治奴役亚洲各国人民。历史完全被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和颠倒了。

其次,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还不顾历史事实,极力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的战争罪行鸣冤叫屈,称东条英机等战犯为日本“国家领

领导人”，“对和平的犯罪”是指发动非自卫战争的罪行，但用这种罪行对一国领导人进行处罚，在那时为止的国际法历史上是没有的”。言外之意，东条英机等人发动的是“自卫”战争，谈不上是“对和平的犯罪”，当然也就不应该用这种罪行对他们进行处罚了。它还把应由东条英机等人承担的给日本人民带来战争灾难的责任，通通推到反战各国及其人民身上。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美军对日本进行狂轰滥炸和投掷原子弹，也造成巨大人员伤亡”。我们否认在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战争过程中，日本士兵和平民也有牺牲。我们也不否认美军对日本的狂轰滥炸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人类历史上头两颗原子弹，给这两个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造成了数十万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死亡和牺牲。我们对这些无辜者的牺牲同样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悼念，对以和平百姓为屠杀对象的战争行为和暴行同样表示愤慨和谴责。笔者就曾在1989年7月和1997年11月访日期间两次前往广岛参观和平公园，并对在原子弹爆炸中牺牲的平民百姓表示悼念。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始终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战争，不仅是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灾难，同样也是日本人民的灾难，因而呼吁日本人民与我们一道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复活，防止50多年前苦难历史的重演。但是，我们又认为日本人民所蒙受的战争灾难是东条英机等少数战犯造成的，不能把这个帐记到反战各国及其人民身上，不能因为日本也有“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牺牲”、美军投掷原子弹造成了日本的“巨大人员伤亡”，就藉此为东条英机等少数战争罪犯推卸责任、开脱罪责，为其亡灵招魂，喊冤叫屈，把他们打扮成不应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和惩处的“国家领导人”。试问：如果不是日本少数战犯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事变，将广大日本人民绑上军国主义分子的

战车,又怎么会有日本“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牺牲”,日本的“巨大人员伤亡”?又怎么会有日本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投降和东条英机等战犯的受审呢?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前因后果,不能倒果为因,把东条英机等战争始作俑者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日本右翼新教科书倒果为因,完全颠倒是非。

第三,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继承了日本老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修改历史教科书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服务的衣钵,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重视历史等教科书的作用,以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手法,为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需要服务,并不是日本右翼分子今天的新发明,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就曾在伪“满洲国”、华北沦陷区、汪伪“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不止一次地搞过各类中小学课本的修订、审查活动。1937年7月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日伪当局便立即成立了一个“临时教科书审查委员会”,拟定统一标准:凡有“妨碍邦交”、“宣传(国民)党义及孙文事项”、“隐含赤化”等内容者,一律“全篇者撕去之”、“半篇者糊盖之”、“数语或数行涂改之”,明确规定要将国语、历史、地理、常识课本中有关爱国、抗日的内容删去。8月18日,审查委员会开始对中小学及短期小学、简易师范、社会教育各学校所用教科书进行全面审查。21日,小学组开始复审。复审委员会由北平当局第五组(文化组)日本顾问武田熙、西田耕一、桥川时雄等人组成。9月2日,小学组复审结束,将各教科书应删内容制成表格,下发各小学遵照执行。如朱翊新著、世界书局出版的《高小新历史》,被要求删去第四章第三节“明朝所受的倭患怎样”、第十四章第二节“孙中山先生……大政治家”、该章第五节“孙文学说有什么特色”、第十六章第一节“吸收中国的文化”等内容。又如朱翊新著、世界书局出版的《高小国语读本》,被要求删去第七章“军歌”、第十三章“国庆日的来历”、第二十章“台

湾抗日始末”、第三十章“蔡松坡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等内容。由此可见,今天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继承的完全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老传统、旧衣钵。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继承其衣钵,其目的何在?不也是昭然若揭了吗?事实说明,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这能不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和重视吗?

总而言之,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了历史,颠倒是非,又企图重演当年的侵略历史,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姜 涛

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反映了日本政府、日本统治集团粉饰历史、企图逃脱战争罪责,欺蒙年轻一代、欺蒙世人的丑恶嘴脸。

我是学近代史的。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近代史,有大半部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而同样也可以这样说,一部日本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日本侵华史。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野心勃勃,一心要征服世界。而要征服世界,首先是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又必须征服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这是它绝对绕不过去的。过去它是想方设法侵略中国,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今天则是鄙视中国、丑化中国,并企图继续分裂中国。这次的教科书事件,就反映了日本右翼势力和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卑劣心态。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一天也没有放弃过侵略别人、奴役别人、剥削别人。这次的教科书事件是其狼子野心的充分暴露。

但日本政府现在这样做,并不表明它的强大,而恰恰表明其内心的怯懦。因为它不敢正视历史事实。但是要它改,也很难。说到底,这是日本战后继续维持天皇体制的结果,是日本经济、军事实力增长的结果,是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制约,此长彼消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对其今后的走向,固然要因势利导,力争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也不必抱太多的幻想。

问题是我们中国自己怎么办?我看是八个字:丢掉幻想,揭露真相。

我们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去做:

一是对外,要据理力争,表明我们的态度。经济、军事落后固然就要挨打,但政治、外交的软弱更要受人欺侮。我们一定要向世界、向日本表明我们的绝不妥协的态度。

二是对内,必须信任我们的人民,真正动员起我们的人民。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

早在194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说过: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战争教育和锻炼了我们的上一代。老一辈人的耳提面命,战后初期的历史发展,也教育和锻炼了我们的这一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用那种奋起救亡图存的精神,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义勇军进行曲》还是要继续唱下去,但不能再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筑长城,而应该用高科技、用我们的现代化筑成我们新的钢铁长城!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的职责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要认真地发掘史料。抗日战争史中的重大事件,一件件,一桩桩,都要争取弄清楚,力求准确地得出我们的结论。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曾景忠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者,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尽力掩盖,并且粉饰美化,似乎日本对外侵略不仅无过,而且还大有功劳。我们来看看它使用的是些什么伎俩。

一是混淆。该教科书混淆战争双方侵略与抵抗、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以逃避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教科书说:战争中“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例如苏联将日本俘虏押解到西伯利亚强迫劳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造成日本巨大伤亡。不错,日本士兵和平民在战争中确有大量伤亡,但其责任应由谁负?难道不应该由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负吗?日本民族内部没有能够制止战争的发生,最后遭到了惩罚,可以说,这是日本民族自身酿成的苦果,从一定的意义说,这是“自害”。而在日本发动的战争中,被侵略的中国和亚洲人民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不仅比日本兵民伤亡数量多得多,而且这完全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日本侵略者是“加害者”,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受到的战争磨难完全是“受害”。怎么可

以把向外侵略的民族自酿苦果,与受侵略民族受到的损害,加以混淆,将“加害”与“受害”混为一谈呢?

二是洗刷。教科书说:“在迄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日本也不例外。”写这句话的目的,是想洗刷日本战争中屠杀受害国军民的罪行。既然任何发动战争的国家都杀了不少人,日本人屠杀了大批他国人民也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这就是日本教科书的逻辑。对于南京大屠杀,虽然教科书没有敢完全否定,说成是“虚构”,但它写成:日本占领南京后,“这时日本军队使民众中也出现了许多死伤者——南京事件。”它不提“大屠杀”,又说得含糊其词,躲躲闪闪,把日军屠杀的责任偷偷地冲淡开脱了。而且,对此加了一个注,说是“东京审判认定”了“南京事件”,但“资料上也有一些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至今争论仍在继续”。这样利用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喧嚣,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似有似无,变相加以否定。

三是对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肆意加以贴金。教科书说:“(大东亚战争)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书中吹嘘印度、印尼、缅甸等国家的独立得益于“大东亚战争”,说“日本军队的南下也成为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一个契机”。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各民族逐步觉醒,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锻炼,列强统治下的亚洲各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战后许多国家争得了独立。教科书把亚洲各国的独立归功于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真是荒谬绝伦,恬不知耻。日本向外扩张一开头就夺占台湾、吞并朝鲜,九一八事变后它肢解中国领土,成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后来占领大半个中国,占领许多亚洲国家,都是扼杀民族独立,破坏别国主权的行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领教过日本侵略者对民族独立的态度。日本侵略者是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死敌,它竟有脸说成似乎日本帮助

亚洲各国独立。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利用过印度、缅甸的一些反英势力,不过是想操纵他们,成为自己的侵略工具,与支持该国民族独立有何相干?教科书这样美化“大东亚战争”,这样歪曲史实、颠倒是非,真令世人惊叹,亦令亚洲各国人民愤慨!

这部教科书的出笼,为“大东亚战争”翻案迈出了新的步伐。但它竟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通过。这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日本政府对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它过去的“反省”“道歉”,是真是假,关系到是否向日本下一代告诉历史真相,关系到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大事。亚洲人民绝不容许日本右翼势力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绝不容许日本政府支持纵容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

战后德日战争观的不同成因

雷 颐

60多年前,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1933年5月10日夜晩,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在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Opernplatz)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2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随后,开始了一系列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

60多年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柏林市政府在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现在改名为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的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

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自己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2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这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文化思想巨人的国度所应有的气概。

德国人的反省是深刻的。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在波兰华沙的死难者纪念碑前长跪赎罪,得到了世人的谅解。对一小撮“新纳粹”的蠢动,深负罪疚感的德意志民族保持着高度警惕,不仅将其宣布为非法,而且毫无隐讳地将“大屠杀”(Holocaust)的历史真相告诉给子孙后代,以防悲剧重演。

与德国深切忏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那个至今仍拒不谢罪的日本。政府的文部省一次次修改(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向子孙后代掩盖侵略的历史;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者的亡灵招魂;对于“南京大屠杀”,一再有人公开否认,认为是“历史的虚构”。今天,有多少日本人相信“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呢?不是总有人撰文为“大东亚共荣圈”辩护,说是其目地并非侵略,而是要把亚洲从“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吗?著名的《文艺春秋》旗下的《马可波罗》杂志几年前曾公然登出一篇名为“战后世界史最大禁忌——纳粹没有毒气室”的长文,声称纳粹并没有用毒气大量杀死犹太人,只是想将集中营的犹太人迁往苏联,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导致了犹太人的大量死亡,是盟军故意用此制造了毒气室神话……

日本国家悔罪意识的匮乏,是由于它的“国体思想”丝毫未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遭惨败,但以“神道”为核心的“皇国”意识形态并未被触及。从明治时候起,日本政府就煞费苦心地将原本属于民间、并无统一神社的神道改造成“万世一系,神圣皇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民间神道”变成了“国家神道”。这种国家神道又由按行政区划遍设的崇奉皇室祖灵的神社而制度化,设有专人管理,通过祭祀、参拜活动而深入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奖励武功,明治政府还创设了影响深远的“靖国神社”,专门祭祀战争中的阵亡者。“皇国”进行的自然是“圣战”,这样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为国捐躯”就是为“圣战”捐躯,便理所当然地由此成“神”,其灵魂永远成为护国神社,与“神圣皇国”融为一体,供人膜拜。这种“国体思想”根本不容对战争进行忏悔。一旦忏悔,必伤国体。换句话说,只有彻底抛弃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彻底忏悔。但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是不可能的。

同样可以设想,如果纳粹政权不是被彻底粉碎而是仅仅被赶回德国境内、仍然大权在握,法西斯意识形态依然是“国家话语”,侵略只是为了“生存空间”,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令人发指的种种罪行被刻意掩盖、粉刷……那么,还有多少德国人会知道、相信法西斯的暴行呢?德国还会有这样深刻的忏悔吗?而杀人魔王希特勒,很可能因为当年在短期内使一个软弱的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束缚而迅速强大、最终凭其震撼世界的赫赫武功而仍被德意志民族当作“一代伟人”而推崇备至……

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时,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21 世纪亚洲和平的重大隐患

居之芬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政府的反对,于21世纪初悍然审议通过了日本右翼教科书,公开向亚洲各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示威和挑衅,给21世纪的亚洲和平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引起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与重视。我仅对其三个主要观点加以揭露和批驳:

一、根本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颠倒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科书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地区从战前就有要求独立的动向,其中日本军队南下也成为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一个契机……”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岂不要颠倒重写?人们不禁要问,日本“自存自卫”,何以要到中国境内发动战争,占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乃至大半个中国?何以要远征美国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大战,占领全东南亚?既然要推动“亚洲各国独立”,日本为何要强迫亚洲各国人民“接受日语教育”、“参拜(日本)神社”、“强迫当地人从事苛酷劳动”、屠杀普通平民,甚至规定中国“鱼米之乡”的津郊和江浙百姓吃大米都要杀头?可见,日本在侵略亚洲的战争中要建立的是日本一国独霸的殖民统治。右翼教科书所兜售的上述观点,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发动战争时宣扬的所谓“皇国史观”,亦即法西斯“强盗史观”。

二、全面推翻东京国际审判的正义判决。教科书称:“这一审判是以日本违反九国条约和不战条约为依据的,但上述条约并未规定对于违反条约的国家领导人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审判”,“东京审判唯一的国际法专家,印度的巴鲁法官提出这一审判缺乏国

际法依据,主张所有被告无罪,但 GHQ 禁止公开发表巴鲁法官的意见书……也不允许对审判进行任何批判”。显然,日本政府是要全面推翻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和惩处,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大小战犯鸣冤招魂。众所周知,东京国际审判根据系统调查,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及千人以上的宣誓证词,核实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判定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并惩办了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建立健全了反对侵略战争的国际法规,为彻底摧毁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巩固二次大战果实,维持世界持久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推翻东京审判,就是要全面推翻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就是要根本否定世界反侵略各国近 10 亿军民,经历 10 余年,牺牲数千万军民浴血奋战赢得的反法西斯胜利成果,就是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挑战,这是我们绝不能容许的。

三、拒绝承认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拒绝对战争罪行作进一步反省、道歉与赔偿。教科书称:“战败后日本对这些国家(指亚洲各受害国)进行了赔偿。”言外之意,已不存在“战争遗留问题”,故拒绝对日本战争罪行再作反省、道歉与赔偿。

战败后日本政府果真对其战争罪行作了深刻反省、道歉与赔偿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战后美国为扼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扶日反共政策下,不仅将日本最大的战争罪魁裕仁天皇及一批甲乙级战犯保释下来,使之逃避了东京国际审判与惩处,也使远东法庭对日本重大战争罪行的调查与审判有许多(包括对亚洲主要受害国的战争赔偿)中途夭折。因此日本的“战争遗留问题”与“民间赔偿问题”远较德国为多。以中朝两国为例,中国是战争中的主要受害国,伤亡军民 3500 万人,战争损失达 6000 亿美元,中国正式要求赔偿总额为 350 亿美元,但战后包括接收日产抵充损失在内总共获赔不足 4 亿美元。韩国迫于美国压力更未获得日本的直接

赔偿。

再以日本在战争中使用占领区强制劳工罪行为例,中国是日本使用强制劳工的最大受害国,14 年战争中,日本强征、奴役、摧残中国强制劳工达 1500 余万人。其中在东北占领区强征和使用 了 1000 余万人,在华北强征输出 700 余万人,本地使用 350 余万人;在中华华南强征输出和本地使用约 150 万人;输往日本、朝鲜 4 万余人,还有相当一批强迫去东南亚作苦工。其中战俘劳工达数十万人。对如此重大的强制劳动罪行,东京国际法庭并未像纽伦堡国际法庭那样立专案进行全面调查审判与惩处,仅将日本迫害中国劳工的典型事件“花冈惨案事件”(即原日本花冈地区中国劳工营共 986 人,被日方迫害致死 418 人,死亡率高达 40% 以上)提交设在横滨的乙级国际审判法庭审理。该法庭在 1948 年 3 月曾作如下判决:将原日本鹿岛组花冈办事处长河野正敏等 6 名主要案犯分别判处绞刑(3 人)、终身刑(1 人)与 20 年徒刑。但此后日本政府并未执行判决,反而于 1953 年将上述 6 名案犯全部释放,更不用说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赔偿了。

在日本右翼教科书继续歪曲历史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各占领区所犯下的严重暴行进行全面调查、取证、揭露和清算,以使日本广大国民和青年真正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年在海外在各占领国的法西斯真面目,以及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从而起来制止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坚持走和平建国道路,为共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造福人类作贡献。

无耻的歪曲与公然的挑衅

卞修跃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02年度开始采用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部分,8家出版社送审的教科书稿全部获得通过,其中即包括由扶桑社送审的、由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主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版本。这一版本,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美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度淡化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军在海外所犯下的极端暴行、大肆宣扬“皇国史观”和侵略有功论,公然为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军国主义举幡招魂,因而引起了中国、韩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怒并遭到强烈谴责。

这一次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同时也向世人表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却伴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日本政府的纵容和部分日本国民的默许,重新壮大起来,形成一股在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最为反动的、倒退的强大力量,其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蔑视已到了极其狂妄的地步,其所掀起的波澜和逆流已经到了足以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严重的现实的威胁的程度。这一点,理应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亚洲其他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关注、高度重视和及时而有力地批判和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8家出版商在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上严重“改恶”的历史教科书的出笼及最终被文部省“检合格”而获得通过,与当今日本国内政治的严重右倾化之间有着

极其密切的关系,与日本社会在各种名义或借口下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有意纵容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与日本国家和政府在对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不讲信誉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任何国家,不论其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国家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国民教育都是国家政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和任务,这一点在日本同样也不例外;学校教育是一个国家之国民教育最为重要的场所,是体现国家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政策的根本重地,是一个国家政府完成其所负的国民教育工作、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最为直接的承担者;教科书既是文化知识、思想观念的物质性载体,同时也是国家向其国民、尤其是下一代国民传播知识、灌输思想观念、宣扬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根本媒介;历史教科书作为这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之一,负有向本国国民传播本国或世界历史知识、宣传本国优秀历史传统和人类进步的文化成就、向本国国民输入正确的历史观、从而增养国民的现实责任感和合乎人类智性的文化观念、处事理念和道德信仰的重大使命。日本文部科学省作为日本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机构,根据其本国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其国内各类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大约每隔4年审定一次,正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然而,在战后50多年里,其这一行为中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告人但又昭然若揭的企图,那就是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战争罪恶,宣扬“皇国史观”,为其侵略亚洲国家的罪恶历史翻案,从而达到恢复战前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和方针政策,把日本国民重新纳入战前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的约束之中。从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的所做所为,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它的这种企图。历史教科书事件表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的民间团体的图谋和行为,与日本国家政府的纵容和文部省裁定认可的政府行为,互为表里,相为上下;其右派团体和国家政府,已经紧紧地抱在一起,

结为一体,歪曲历史,推卸罪责,美化侵略;在战后半个多世界中飘荡在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幽魂,已经借着右翼教科书这一还魂之尸而复活,向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发起了公然的挑衅。

面对着日本政府和在日本社会日趋主流的右翼势力结为一体、联合一致的公开挑衅,面对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勃兴及其对我们形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我们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联合亚洲其他国家的抗战史研究专家乃至日本国内的正义人士,运用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对日本右派教科书和其他一切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宣扬荒谬历史观的“作品”予以严厉的批判,与日本国内的蓄意篡改历史的所谓学者进行毫无妥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我们必须运用一切可资运用的现实性力量:社会的舆论、外交的压力、经济性行为乃至国家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性支持、中国企业界对学术界的强力支持,等等。总之,我们不能只是局限于“批判的武器”上,而应该对其进行“武器的批判”,让日本国家、日本政府、日本社会感受到实在的压力,让那些在中国大发横财、却在其国内斥巨资支持日本右派团体编纂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日本企业切实感受到某种程度的不便或其在华利益的威胁,运用一切传媒向日本国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一个真实的日本侵华罪恶史,教育我们的国民和后世子孙永远铭记日本所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巨大苦难,以打垮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公然挑衅,遏止由于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对我们构成的现实性威胁的发展势头,以捍卫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严,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慰安妇”何时得以昭雪

刘 萍

2001年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强烈抗议,公然通过了由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并宣布在2002年正式启用。至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借修改历史教科书,妄图为军国主义翻案的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部被日本文部省宣称为“合格”的新教科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历史不是科学”的幌子下,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二是淡化、掩盖战争罪行。编撰者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的逻辑出发,淡化南京大屠杀,并删去了对“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在右翼势力认为是“自虐”内容的表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慰安妇”问题作为战后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备受世人关注。“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最野蛮、最无人性的制度。二战期间,日军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强行征集、抓捕中国、朝鲜、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妇女充当战争性奴隶,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数十万妇女遭受了残酷的性虐待和迫害。笔者曾经亲自参加过对国内幸存的原“慰安妇”的调查取证工作,亲耳聆听了受害妇女对其悲惨遭遇的诉说,亲眼目睹了幸存受害妇女的凄凉晚景。在我采访过的受害妇女中,有的沦为日军的性奴隶时只有十三、四岁,她们中有许多人被日军折磨致死,幸存下来的也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疾病,有的终身丧失了生育能力,其惨状无法用语言述说。

原“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披露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爱好和平

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但却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谩骂。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从1994年起,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吸取日本正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引入书中。1997年,又有7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表述。但是,日本右翼团体却攻击新版教科书将涉及日军战争罪行的内容引入书中是“自虐史观”。1997年1月,由持“自由主义史观”的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其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叫嚣“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出去。应该看到,日本右翼的嚣张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多年来它一直得到日本政府的怂恿和支持。近年来,在国内外正义人士和法律工作者的援助下,中国、朝鲜、韩国的幸存受害妇女多次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赔偿受害妇女损失,但都被日本政府无理驳回或判决败诉。就在文部省宣布新版教科书“合法”前夕,2001年3月26日,日本东京一地方法院判决40名韩国籍原日军“慰安妇”的索赔案败诉。3月29日,广岛一高级法院判决推翻了当地一法院1998年做出的关于对3名韩国籍原“慰安妇”进行赔偿的裁定(1998年,该地方法院认定,日本应向3名“慰安妇”每人支付2440美元的赔偿。这是原慰安妇唯一一次通过法律途径赢得的诉讼)。这一诉讼的败诉,与教科书事件一样,充分表明日本政府对战争性质及战争责任的认识正在发生严重的倒退,日本社会政治日益右倾化。在这种形势下,原慰安妇获取诉讼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目前,除继续寻求舆论和法律的援助外,我觉得还应该注意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搜寻更加客观、真实、直接的证据材料,特别是日文档案材料。目前,有关“慰安妇”问题材料的缺失与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成比例。日本右翼势力一再攻击有关“慰安妇”的证言证词有夸大不真实的成份。我在与日本学者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一

再表示,迫切希望能找到更多日文方面的档案材料,如日军直接下达的命令、电报、文件等等。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才能给日本右翼以有力的还击。这一方面有赖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更有赖于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呼吁下,良心发现,把在关的档案材料公之于众。

二是寻求更广泛的国际援助和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施以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呼吁,“慰安妇”问题也引起联合国人权机构的重视。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官员亲自赴日与日本政府举行会谈。1993年3月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大会上,朝鲜代表要求联合国人权组织对“慰安妇”问题应“尽早采取措施”,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1996年4月和1998年6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先后通过的决议认为,日本负有战争责任,应对受害者予以个人赔偿。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惩治措施和压力,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等诸多问题上,仍然采取否认、推诿、狡辩等手段,根本不愿,也不想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解决问题。因此,仅靠幸存受害妇女的申诉和国内外人士的呼吁还不够,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力量。目前,一些学者已认识到,我们与日本右翼的斗争已经不是学术层面上的论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就不能不采取政治手段。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70周年,在这个举国难忘的70周年纪念日前夕,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出笼,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